

国学新读本

春秋繁露

曾振宇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解读国学典籍奥义
寻绎传统文化脉络
追溯民族精神本源
探索未来文化方向

ISBN 978-7-81091-106-1



9 787810 911061 >

定价：45.00元

国学新读本

春秋繁露

曾振宇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秋繁露 / 曾振宇注说.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 - 7 - 81091 - 106 - 1

I. 春… II. 曾… III. ①儒家②春秋繁露—注释 IV.
B234.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997 号

责任编辑 龚留柱

责任校对 龙田

封面设计 马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 - 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

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地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

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1)
《春秋繁露》通说	(1)
楚庄王第一	(115)
玉杯第二	(125)
竹林第三	(135)
玉英第四	(145)
精华第五	(154)
王道第六	(160)
灭国上第七	(172)
灭国下第八	(174)
随本消息第九	(176)
盟会要第十	(179)
正贯第十一	(181)
十指第十二	(183)
重政第十三	(185)
服制像第十四	(188)

二端第十五	(190)
符瑞第十六	(192)
俞序第十七	(193)
离合根第十八	(196)
立元神第十九	(198)
保位权第二十	(202)
考功名第二十一	(205)
通国身第二十二	(208)
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	(209)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220)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	(224)
服制第二十六	(227)
度制第二十七	(229)
爵国第二十八	(232)
仁义法第二十九	(239)
必仁且智第三十	(244)
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	(248)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251)
观德第三十三	(253)
奉本第三十四	(258)
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262)
实性第三十六	(270)
诸侯第三十七	(273)
五行对第三十八	(274)
第三十九[缺]	(276)

第四十[缺]	(276)
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276)
五行之义第四十二	(279)
阳尊阴卑第四十三	(281)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285)
天容第四十五	(289)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291)
阴阳位第四十七	(294)
阴阳终始第四十八	(295)
阴阳义第四十九	(297)
阴阳出入上下第五十	(299)
天道无二第五十一	(301)
暖燠常多第五十二	(303)
基义第五十三	(305)
第五十四[缺]	(308)
四时之副第五十五	(308)
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310)
同类相动第五十七	(313)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316)
五行相胜第五十九	(319)
五行顺逆第六十	(322)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325)
治乱五行第六十二	(326)
五行变救第六十三	(327)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329)

郊语第六十五	(332)
郊义第六十六	(335)
郊祭第六十七	(336)
四祭第六十八	(338)
郊祀第六十九	(340)
顺命第七十	(342)
郊事对第七十一	(345)
执贽第七十二	(348)
山川颂第七十三	(350)
求雨第七十四	(352)
止雨第七十五	(356)
祭义第七十六	(358)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361)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369)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372)
如天之为第八十	(374)
天地阴阳第八十一	(376)
天道施第八十二	(379)
参考文献	(382)

《春秋繁露》通说

一 董仲舒其人其书

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经过子思、孟子、荀子等人的努力，得以薪火相传。迨至两汉时期，儒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黄老学派的一些思想被儒家学派吸纳，西汉时期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家。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将汉代儒家称之为“新儒家”。在这一历史阶段，最有名的儒家代表人物当属董仲舒。《汉书·五行志》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家宗。”作为“儒家宗”的董仲舒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伟人，《春秋繁露》一书中所体现的博大精深、意蕴深奥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董仲舒其人

董仲舒大约出生于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约卒于汉武

帝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①,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历代留传下来的有关他的思想的资料不算太少,但记录他的生平事迹的材料却是凤毛麟角、雪泥鸿爪,后人只能从《史记》、《汉书》、《春秋繁露》、《艺文类聚》等典籍中寻觅些许有关董仲舒一生行事的稀疏史影。

1. “天人三策”

董仲舒从小研习《春秋》,对这一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鲁国史籍非常熟稔。《史记·儒林列传》说,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文帝元年(公元前 179 年),董仲舒大约 20 岁。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 141 年),董仲舒大约 58 岁。也就是说,从 20 岁到 58 岁左右的这段时间里,董仲舒因为精通《春秋》,而成为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学官(博士)。

博士是古代学官的名称,它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汉书·贾山传》说贾山的“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一位是鲁国博士,另一位是魏国博士。由此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博士一职已经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博士设置因循不变。秦始皇时代有博士 70 人,秦二世时期有博士诸生 30 多人,其中有姓名可考者达 12 人,如见于《史记》、《汉书》的有博士仆射周青臣和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黄疵、正先 7 人。另外,根据《古今姓氏书辨正》等史料记载,还有李克、桂贞、卢敖、圈公、沈遂 5 人。从学派上看,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圈公、李克 6 人属于儒家,黄疵是名家,卢敖是神仙家,其余几人难下论断。由此可见,在可判学派归属的 8 名博士当

^① 学界在董仲舒生卒年问题上一直有争议。金春峰认为董仲舒生卒年为公元前 179 年至前 104 年;王永祥则认为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 192 年至前 191 年之间,约卒于公元前 107 年至前 104 年之间。

中，儒家占了大多数。李斯的焚书之奏建议“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①。李斯将《诗》、《书》放在首位，也说明秦王朝博士官是诸家并立、以儒家为主的格局。汉承秦制，因循未变。汉高祖曾经拜叔孙通为博士，但西汉初期因为天下甫定，百废待兴，博士学官的建制不太健全。到汉文帝时期，情况才转入正轨，博士已达七十多人，博士的数目和秦王朝的相差无几^②。

董仲舒是因通《公羊春秋》当上博士的。设专经博士的制度，大概形成于汉文帝时期。文、景之时，专门研究《诗》的博士有鲁人申公、燕人韩婴、齐人辕固生；专门研究《书》的博士有晁错；治《春秋》的博士有胡毋（母）生、公孙弘、董仲舒、江生；治《易》的博士有张生、欧阳生、兒宽；治《孟子》、《尔雅》、《孝经》的也有博士。当时还没有“罢黜百家”，博士并非儒家一派垄断，名家博士、方仙道博士也可招收弟子、传授师法。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下诏以《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为法定经典，并且设立博士，其他非五经博士都被罢黜。从此以后，博士之职为儒家一派所专有^③。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十月，刚刚履临九五之尊的汉武帝，下诏命令丞相、御史、列侯等大臣选出“贤良文学”之士，

^①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版。下同不另注。

^② 参见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③ 至南北朝时，“博士”演变为专精一艺的职官。如西晋专有律学博士，北魏专有医学博士，隋唐有国子、四门博士和算学博士、书学博士等等。宋代以后，开始重视实际操作的特种行业技艺，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一概称为博士，从此，博士的名位向餐饮服务行业的茶坊、酒店中普及。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记载：“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

将他们召集起来，由他亲自考试。他以皇帝的名义提出问题（策问），让那些“贤良文学”们回答（对策）。在前后三次策问中，汉武帝提出了几个问题求教于这些饱学之士：

其一，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夏、商、周三代天子各受天命，天命分别表现在哪些祥瑞上？这一提问实际上是对王权存在合理性的形而上的追问。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王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①。”董仲舒认为，王权源于神权，人间的王权只有得到了天命这一最高神权的认可，才具备合理存在的证明。这种证明不是超验的，而是经验的，其外在直观表现就是祥瑞。譬如，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一条白鱼跃入周武王舟中，这就是天命对周武王伐纣行为的嘉许和对周武革命的认可。董仲舒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心向背是天瑞的终级依据。人间的王权只有得到了普天下大多数人的拥护，“归之如流水”，上天才会顺应民心，“天瑞应诚而至”。

其二，汉武帝问：“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水旱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本来是一个涉及到天文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方面问题，但是，精通阴阳五行之术的董仲舒却作了另一番解释：“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

①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不另注。

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①董仲舒认为，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实质上它和天降祥瑞一样，是上天意志的直观表现形式——“谴告”。如果人间的君王残贼百姓、暴虐无道，使之生灵涂炭，万户萧索，上天就会通过水旱之灾、日食月食等自然怪异现象予以警告；倘若统治者仍然执迷不悟，不思悔改，上天就会更换王命，使江山易主。

其三，汉武帝问：“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有人长寿，有人夭亡；有的人名重如山，有的人卑鄙猥琐，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汉武帝的这一提问，涉及到了人性论和生命科学。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徕，动之斯和’，此之谓也。”^②董仲舒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出日后他系统论证的人性学说——“天赋善恶论”，而是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孔子的观点：人民性情的善与恶、好与坏、高尚与卑劣，与政治的清浊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君王圣明，施行仁政，抚恤百姓，人民道德水准就很高，寿命也很长；反之，如果生于乱世，统治者像桀纣一样暴虐奢靡，与人民为敌，人民的道德水准就如同草寇，寿命如同朝露，朝不保夕。人间的政治就像是一位陶工，人民的性情与寿命就像是一堆尚未完成的泥土，这堆泥土将来会塑造成一件件什么样的陶器，取决于陶工自身的素质。

^{①②} 《汉书·董仲舒传》。